

人类的繁荣

巴哈伊国际社团宣言

世界和平的理想，以十年前无法想象的程度，正日益成形并充实。那些长久以来看似不可移易的障碍，已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崩塌；看似无法调和的冲突，已开始让位于磋商与解决的进程；以统一的国际行动对抗军事侵略的意愿，也正在显现。其效果，是在人类大众与众多世界领袖心中，唤醒一种对地球未来的希望，而这种希望曾几近熄灭。

放眼世界，无尽的智识与灵性能量正渴求着表达；其蓄积之势，恰与近数十年来人类所承受的挫败成正比。天下各处，迹象日益增多：地球万民渴望终结冲突，终结那已无任何土地能够幸免的苦难与毁灭。这些日益高涨的求变浪潮，必须加以把握与疏导，用以冲破尚存的藩篱——那些阻挡着古老梦想“世界和平”得以实现的最后障碍。完成此任所需的意志，不能仅靠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对抗社会无数弊病而凝聚。它必须由一幅人类繁荣的愿景——取其最圆满、最本真的含义——来激发：即唤醒人们意识到，灵性与物质福祉，如今已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其受益者，必为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无分彼此，不附加任何与重整人类事务之根本目标无关的条件。

迄今为止，历史所记载的主要是部落、文化、阶级与国家的经历。及至本世纪，随着地球在物质层面的统一，以及对其上所有生灵相互依存的承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历史，方始拉开序幕。人性那漫长而缓慢的教化进程，其发展断断续续，所赋予的物质利益亦参差不齐，且无可否认，颇为不公。然而，承继了过去世代所演进的全部遗传与文化的多样性财富，地球的居民如今面临一项挑战：要汲取这份共同的遗产，自觉而系统地去承担起设计自身未来的责任。

倘若不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路径背后的观念与假设进行一番深刻反思，便妄想构想出文明进阶下一阶段的愿景，那确是不切实际的。在最直观的层面，此种反思必将涉及政策、资源利用、规划程序、实施方法及组织形式等实践议题。然而，随着反思的深入，根本性问题将迅速浮现：所追求的长期目标是什么？需要构建怎样的社会结构？社会正义原则对发展有何意涵？知识在促成持久变革中的性质与作用又如何？诚然，这样的重新审视，终将驱使人们去寻求关于人性本身的广泛共识。

无论概念还是实践层面，所有上述议题皆有两条讨论的途径直通其里。下文将循此二途，探讨全球发展战略这一主题。其一，是关于发展进程之本质与目的之普遍观念；其二，是在这一进程中，各类参与主体所被赋予的角色。

主导当前多数发展规划的种种假设，其本质皆为物质主义的。换言之，发展的目的被界定为：在所有社会中，成功培育那些用以实现物质繁荣的手段——这些手段乃是世界某些地区历经反复试错已然形成的特征。有关发展的论述确实有所修正，以适应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差异，并回应环境恶化所引发的令人警醒的危机。然而，其根基处的物质主义假设，却基本未受触动。

二十世纪行将落幕之际，人们已无法再秉持这样一种信念：源于物质主义人生观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足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关于它将带来种种变革的乐观预言，早已消弭于一道日益撕裂的深渊之中——这道深渊，分隔着世界上为数日寡的少数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准，与全球绝大多数民众所深陷的贫困。

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及其所助长的社会崩溃，反映出关于人性本身的一种根本谬误。因为由现行秩序的种种诱因从人身上所能唤起的回应，不仅不足，在世界性事件面前，竟显得近乎无足轻重。这启示我们：除非社会发展的目标超越单纯的物质条件改善，否则就连这些物质目标本身，也终将无法达成。这个目标，必须求索于生命与动力的灵性维度——它超越瞬息万变的经济格局，也超越将人类社会硬性划分为“发达”与“发展中”的人为界限。

随着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义，审视发展进程中各主要行动者所应扮演的适当角色，其既有假设也必将重估。各级政府的关键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后世之人将几乎无法理解：在一个推崇平等主义哲学及相关民主原则的时代，发展规划**竟将普罗大众视为本质上仅为援助与培训的受惠者**。尽管参与已被承认为一项原则，但留给世界多数人口的决策空间，充其量是次要的——局限于那些由他们无从介入的机构所制定、且往往与他们自身对现实的认知相悖的目标所划定的选项范围之内。

这种做法，甚至得到了建制宗教的默许或明示支持。囿于家长式传统的重负，主流宗教思想似乎无力将其对人性的灵性维度所宣认的信仰，转化为对人类集体能够超越物质条件的信心。

此种态度，未能领会那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之社会现象的深意。若说世界各国政府正通过联合国系统，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全球秩序，此言不虚；而同样真确的是，世界各国的民众亦正为同一愿景所鼓舞。其回应之表现，便是地方、区域及国际层面上，无数倡导社会变革的运动与组织骤然勃兴，蔚为壮观。人权、妇女地位的提升、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克服偏见、儿童的道

德教育、识字教育、基本卫生保健，以及其他诸多重大关切——每一项都获得了全球各地拥有日益增多支持者的组织的热切倡导。

世界民众对时代迫切需求所作出的回应，恰与巴哈欧拉百多年前发出的呼唤遥相呼应：「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广大普通民众对自身存在的认知，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变——从文明史的尺度衡量，其转变之迅猛，堪称急剧——这一转变，对于人类大众在规划地球未来时所应担当之角色的既有设定，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I

要制定一项能够动员全世界人民为其共同命运承担责任的战略，其基石必须是人类一体的意识。人类同属一族这一观念，在公共论述中看似简单，实则对当代社会大多数机构的运作方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无论表现为公民政府中的对抗结构、大多数民法所依据的抗辩原则、对阶级及其他社会群体间斗争的颂扬，还是渗透于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竞争精神，“冲突”都被视为人际互动的根本动力。而这，不过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日益巩固的物质主义人生观，在社会组织层面的又一呈现。

在一个多世纪前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中，巴哈欧拉运用了一个指向组织全球社会之可行模式的比喻，将世界比作人体。在现象界中，确实再无其他模式可堪我们理性地寄望。人类社会并非仅由大量分化的细胞组成，而是由一个个被赋予以理智与意志的个体所构成的联合体；然而，人类生物性本质的运作方式，恰恰昭示了存在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首要的，便是多元中的统一。看似矛盾却真切的是：正是人体秩序的完整与复杂——以及身体细胞完美地整合其中——才使得每个构成元素所固有的独特潜能得以充分实现。没有细胞能脱离身体而存活，无论是对身体的机能做出贡献，还是从整体的安康中获取其应得的一份。由此达致的身体健康，其意义在于使人类意识的表达成为可能；换言之，生物性发展的目的，超越了身体及其各部分之纯粹存在。

个体生命的真理，于人类社会亦有对应。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是进化进程的先锋。人类意识虽必透过无穷多样的个体心智与动机来运作，却非但无损于其根本的统一，反而正是这固有的多样性，将统一与均质或同一区别开来。巴哈欧拉有言：世界人民今日所经历的，乃是其集体之成年；正是通过人类此番渐趋成熟的进程，多元中的统一这一原则将得以充分彰显。社会组织的过程，自家庭生活的凝聚而肇始，历经氏族与部落的简朴结构，穿越林林总总的城市社会形态，直至民族国家的最终涌现——每一阶段，皆为人类才智的施展开启一方沃土。

显然，人类的进步并非以牺牲个体特性为代价。随着社会组织日益繁复，每个人所潜藏之能力得以施展的天地，也随之扩展。由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下所需的变革，必须在人类意识与社会制度结构这两个维度上同步发生。全球发展战略的意义，便寓于这双重变革进程所开启的种种可能之中。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该战略的目的，便是要奠定恒久的根基，使地球文明得以逐渐成形。

为全球文明奠定根基，需要创立在性质与权威上皆具普世性的法律与制度。唯有当掌握决策之责的人们，由衷接纳了人类一体的理念，并透过教育体系与大众传播媒介，将此相关原则广为传扬，这项努力方能真正起步。一旦跨过这道门槛，一个新的进程便将启动，吸引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制定共同目标，并投身于其实现。唯此根本性的转向，方能护佑他们免于种族与宗教宿怨的古老荼毒。唯当地球上的居民日渐觉醒，意识到自己本属同一民族，他们方能摆脱过往主导社会组织的冲突模式，开始习得协作与和解之道。巴哈欧拉有言：“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

II

正义之力，能将人类一体之渐醒意识，熔铸为集体意志，进而从容构筑全球共同体生活所需之架构。当今之世，世界人民与各类信息及多元思想的接触日益广泛，正义必将彰显自身，成为成功社会组织之统御原则。关乎地球发展的各项方略，必须愈发频繁地接受正义准则所要求的光明磊落之检验。

在个人层面，正义是人的灵魂之一种官能，使人得以辨别真伪。巴哈欧拉断言，在上帝眼中，正义是“万物中最受钟爱者”，因为它使每个人能以自己的眼睛而非他人的眼睛去观察，凭自己的知识而非邻人或群体的知识去认知。它要求人在判断时持守公正，待人接物讲求公道，因此，它是日常生活中一位要求虽高却形影不离的良伴。

在群体层面，对正义的关切是集体决策中不可或缺的指南针，因为它是达成思想与行动之统一的唯一途径。正义绝非鼓励那种在过去时代常假其名而行的惩罚精神，而是对以下认知的实践性表达：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个体与社会的利益紧密交织，不可分割。当正义成为人际互动的指导性原则时，一种有利于磋商的气氛便得以形成——使人们能够冷静审视各种选项，选择合宜的行动路径。在此氛围中，操纵与派系之争这些由来已久的倾向，便更难扭曲决策的过程。

对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正义之影响，至为深远。对正义的关切，能在界定进步的使命中，筑起一道防线，防止为让少数特权阶层坐享技术突破的便利，而牺牲人类大众乃至地球本身的福祉。在设计与规划层面，正义确保有限的资

源不致被挪用于那些与社群根本的社会或经济要务无关的项目。而最为紧要的是，唯有那些被认为切合民众需求、目标公正公平的发展方案，方有希望赢得民众的委身——而民众的投入，恰是方案得以落实的关键。当社会中的每一分子——乃至每一个构成群体——都能确信，他们受到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的准则所庇护，并能公平分享其惠益时，诚实、勤勉、协作等可贵的人性品质，便能成功地调动起来，去完成那些要求甚高的集体目标。

因此，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其核心在于人权议题。制定这样的战略，需要将促进人权的事业，从长久以来挟持着它的种种虚假二分法中解放出来。关切每个人都应享有有助于其个人成长的思想与行动自由，并不能成为尊崇个人主义崇拜的理由——这种崇拜正深刻地败坏着当代生活的诸多领域。同样，关切确保整个社会的福祉，也并非要求将国家神化为人类福祉的源头。事实远非如此：本世纪的历史已昭然若揭，这些意识形态及其所催生的党派议程，恰恰构成了它们自称要服务的那些利益的主要敌人。唯有在人类有机一体意识所催生的磋商框架内，对人权的全方位关切才能寻得其合法且富有创意的表达。

当今，肩负着创立这一框架、并将促进人权的事业从其利用者手中解放出来的重任的，是那个诞生于两次毁灭性世界大战之悲剧与全球性经济崩溃之教训的国际机构体系。意味深长的是，“人权”一词，乃是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颁布及三年后《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方始普遍使用。在这两份创造历史的文献中，尊重社会正义被正式承认为建立世界和平的必然关联。而《宣言》在联合国大会无反对票通过这一事实，从一开始便赋予它一种权威，此权威在此后的岁月中与日俱增。

与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意识——联系最为紧密的活动，乃是个人亲自对现实进行探索。探求存在之目的的自由，以及发展那些使此目的得以实现的人性禀赋的自由，必须受到保护。人必须有求知的自由。此种自由虽常遭滥用，且当代社会的某些风气更对此滥用推波助澜，然则这一切丝毫不损于这天性冲动本身的正当性。

正是人类意识这独有的根本驱动力，为《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公约所载诸多权利的申明，提供了道义上的必然要求。普及教育、迁徙自由、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凡此种种，皆为这一驱动力运作的体现，亟需国际社会予以明确保障。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以及持有见解并恰当表达见解的权利，亦然。

既然人类一体，不可分割，则每个降生于世者，皆是交托给这整体的信托。此信托关系，构成了联合国诸文件同样试图界定的其他大多数权利——主要是经济与社会权利——的道德基础。家庭与居所的安全、财产权、隐私权，皆为此信

托关系所蕴涵。社群对个体成员所负之责，更延伸至提供就业、身心保健、社会保障、公平薪酬、休憩与娱乐，以及诸多其他合理的期许。

集体信托的原则，亦赋予每个人皆有权期许：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文化条件，应受国内及国际法律的保障。恰如基因库之于人类及其环境的生物性生命，数千年来所成就的丰沛文化多样性，对于正经历集体成熟时期的人类之社会与经济发展，亦是至关重要。它代表着一份遗产，必须在全球文明中得以结出硕果。一方面，文化表达需要受到保护，免遭当今盛行的物质主义影响之窒息。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必须能够在不断推陈出新的文明形态中相互交流，免于为派系政治目的所操弄。

巴哈欧拉说：“正义乃人类之明灯。勿让压迫与暴政之逆风熄灭它。正义之目的乃是在人间实现团结。神圣智慧之洋在此崇高话语中澎湃，而举世之书册不能尽载其深意。”

III

要使国际社会正日趋形成之人权标准，得以提升并确立为普遍通行的国际准则，便须对人际关系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义。当今，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成员与其机构之间的关系上，那些被视为自然而恰当的种种观念，所反映的不过是人类种族在其早期较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所达到的理解层次。若人类确已步入成年期，若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确属同一个民族，若正义确为社会组织的统御原则——那么，那些因未识这些新兴现实而产生的既有观念，便必须予以重塑。

朝此方向的努力，方兴未艾。随着其逐步展开，它将引领我们重新理解家庭的本质，以及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权利与责任。它将彻底改变妇女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角色。它对人与工作之关系的重塑，以及对经济生活在人类生命中之地位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它将为人类事务的治理，以及为执行此治理而创立的制度，带来深远的变革。在其影响下，社会中迅速涌现的非政府组织之工作，将日臻合理化。它将确保创制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以保护环境与所有民族的发展需求。最终，这场运动已然在推动的联合国体系之重组与变革，必将导向一个世界联邦的建立——其自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机构。

重新构想人际关系体系的使命，其核心在于巴哈欧拉所言的磋商程序。祂告诫道：“凡事皆需磋商。经由磋商，领悟力这一禀赋方显成熟。”

磋商所要求的求真标准，远非谈判与妥协之类处理人间事务的通行模式所能及。它无法在抗议文化中实现——事实上，这种文化严重阻碍了它的达成；而抗议文化正是当代社会另一普遍特征。辩论、鼓吹、对抗之法，以及长期以来作为

集体行动特征的整套派系伎俩，都从根本上与其目的相悖：即就特定情境之真相达成共识，并在任何给定时刻的诸多选项中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巴哈欧拉所倡导的，是一种磋商的过程：参与者须努力超越自身既有观点，以便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成员而运作——此整体自有其利益与目标。在此坦诚与礼敬兼备的氛围中，观点不再属于提出它的个人，而属于整个集体；集体依循最能服务于其既定目标之标准，予以采纳、摒弃或修正。磋商之成功与否，系于所有参与者是否支持最终议决，无论其参与讨论之初持何种个人见解。在此种氛围下，若经验暴露先前决定之不足，亦可随时重新考量。

由此观之，磋商乃是正义在人类事务中的运作表现。它对集体努力的成功如此至关重要，以致必须成为可行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特征。事实上，唯有当磋商成为每一项计划的组织原则时，那些其承诺与努力决定该战略成败的人民的参与，才会真正有效。巴哈欧拉劝谕道：“人唯行正义，方可达其真正地位；人唯凭团结，才会保有力量；人唯借磋商，始能获得安乐福祉。”

建设全球社会所涉及的任务，要求具备的能力水平，远非人类迄今所能动员者可比。欲达此等水平，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须大幅扩展获取知识的途径。普及教育将成为这能力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贡献者，然而，唯有当人类事务被如此重组，使社会各个层面的个体与群体皆能获取知识，并运用其塑造人类事务时，此项努力方能成功。

有史以来，人类意识的表达与演进，始终依托于两个基本的知识体系：科学与宗教。通过这两大载体，人类的经验得以组织，周遭环境得以诠释，潜藏的能力得以探索，道德与智性生活得以规约。它们堪称文明真正的缔造者。显而易见，以今日之后见之明审视，科学与宗教各司其职、协调并进的时期，正是这双重结构效能最为彰显的时代。

科学既已赢得举世之尊崇，其资格自无需赘述。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语境下，问题实则在于：科学技术活动应如何组织？若将相关工作主要视为少数国家中既得精英的专属领域，则此种格局已然造成的全球贫富鸿沟，显然只会持续加深，并招致如前所述的世界经济灾难性后果。诚然，倘若人类大多数仍主要被视作外来所创科技产品的使用者，那么那些表面为满足其需求而设的种种计划，则不宜冠以“发展”之名。

因此，扩展科学与技术活动，便成为一项核心的挑战——且是至为艰巨的挑战。如此强大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工具，不应再是社会优势群体的专属之物，而必须加以重组，使各地人民皆能凭其能力参与其中。除了需要创制计划，让所有能够受益者皆可获得所需教育外，此种重组还须在世界各地建立富有活力的知识中

心——这些机构将增强世界各民族参与知识创造与应用的能力。发展战略在承认个体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同时，必须将以下任务列为主要目标：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能够平等地接近科学与技术进程——此乃他们与生俱来的共同权利。随着通讯技术的加速革命，信息与培训现已触达全球无数民众——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其文化背景为何——那些固守现状的陈词滥调，亦日渐失去其说服力。

人类在宗教生活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其性质虽卓然不同，其艰巨却毫不逊色。对全球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人性具有灵性维度——甚至其根本身份乃是灵性的——此乃不证自明的真理。此种对实在的感知，可见于文明的最早记录，且数千年来为过往每一伟大的宗教传统所精心培育。它在法律、艺术及人类交往的文明化方面所成就的不朽建树，赋予了历史以实质与意义。其启迪，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日影响着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而正如当今世界诸般事件所生动昭示的，它所唤醒的渴望，既不可磨灭，亦具有无可估量的力量。

因此，显而易见，任何旨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都必须寻求调动如此普遍且极具创造力的人之潜能。然则，为何人类所面临的灵性议题，至今未能成为发展话语的核心？为何国际发展议程的多数优先项——乃至其多数基本假设——始终由地球上仅有少数人信奉的物质主义世界观所决定？对于那些口称尊崇全民参与原则、实则否定参与者构成其身份认同的文化经验之有效性的论调，我们又能给予多少信任？

或有人辩称，灵性与道德议题，历来与相互争持且无法客观证明的神学教义纠缠一处，故应置于国际社会发展关切的范围之外。若予其任何重要角色，势将敞开大门，容那些曾滋养社会冲突、阻碍人类进步的教条影响登堂入室。此种论调，无疑有几分道理。世界诸神学体系的倡导者，不仅对信仰本身在众多进步思想家眼中声誉扫地负有重责，亦对人类持续探讨灵性意义的进程所遭遇的抑制与扭曲难辞其咎。然而，若据此断言，出路在于遏止对灵性实在的探究，并漠视人类动机最深层的根源，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谬见。近代历史中，此类钳制得行其道的唯一后果，便是将人类未来的塑造权，拱手让予一种新正统派——其主张真理无关道德，事实独立于价值。

就现世生命而言，宗教最伟大的成就，多属道德层面。通过其教义，以及那些被此教义之光所照亮的人生典范，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民众，都培养了爱的能力。他们学会了克制天性中的动物本能，为公众福祉作出巨大牺牲，实践宽恕、慷慨与信任，并以推动文明进步的方式运用财富与其他资源。人们创建了制度体系，将这些道德进步广泛地转化为社会生活之规范。纵使因教条附会而晦暗不明，因派系纷争而偏离正道，由克利须那、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耶稣、穆罕默德这些超凡人物所激发的灵性动力，却始终是教化人性品格的主要影响力。

增强人类能力的关键，在于大幅扩展获取知识的途径。唯有围绕科学与宗教之间持续深化、日益密切的对话，方能形成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代表科学成就的洞见与技能，都必须仰赖灵性信念与道德原则之力，以确保其得到恰当运用——此乃不言而喻之理，至少今时今日理应如此。例如，人们需要学会如何区分事实与臆测——乃至辨别主观见解与客观实在；然而，具备此种能力的个人与机构能为人类进步贡献几何，则将取决于他们对真理的忠诚，以及超脱于自身利益与欲念之驱策的程度。科学必须在所有人身上培养的另一项能力，是以过程——包括历史过程——的视角进行思考；然而，此种智性上的提升若要最终有助于推动发展，其视角便不可为种族、文化、性别或派系信仰的偏见所蒙蔽。同理，使地球居民得以参与财富创造的培训，唯有当此驱动力为“服务人类乃个体生命与社会组织之目的”这一灵性洞见所照亮时，方能真正推动发展目标的实现。

V

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在提升人类能力这一整体框架下展开——而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在各层面扩展知识。近数十年的经验表明，物质利益与物质追求，不可视之为目的本身。其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人类对居所、食物、医疗等基本需求，更在于拓展人类能力的疆域。因此，经济发展在人类进步进程中最核心的角色，在于为个人与机构装备必要的手段，使他们得以实现发展的真正宗旨：即为一个能够培育人类意识中无限潜能的新社会秩序奠定根基。

经济思维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毫不含糊地接纳发展的这一宗旨——以及自身在促成实现该宗旨所需之手段的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唯其如此，经济学及相关科学，方能摆脱物质主义执念的逆流——这股逆流如今正使其迷失方向——从而充分实现其作为工具的潜能，去谋求人类完整意义上的福祉。科学之工与宗教之识，亟需一场严谨对话，其必要性，再无比此更彰显者。

贫困问题便是一例。旨在解决此问题的种种方案，皆基于一个信念：物质资源业已存在，或可通过科技努力创造出来，足以缓解乃至最终根除这一人类生活中古老的现象。此目标之所以未能实现，一个主因在于，所需的科技进步所回应的一套优先序列，与人类大众的真实利益仅存微弱关联。若要将贫困的重担从世间彻底卸下，便须对这些优先序列进行根本性的重整。此项成就，要求对合宜价值进行矢志不渝的探求——此探求将深刻考验人类的灵性与科学资源。宗教若仍囿于宗派教义，无法区分知足与消极无为，且宣扬贫困乃尘世生命固有之特征，唯有来世方能解脱，则其对这一共同努力的贡献，必将大受掣肘。欲有效参与为人类带来物质福祉的奋斗，宗教精神必须从其流注的灵感之源中，发掘契合此一寻求在人类事务中建立团结与正义之时代所需的崭新灵性概念与原则。

失业问题也引发类似的议题。在当代大多数思维中，“工作”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简化为旨在获取消费现有商品之手段的有偿就业。这是一个循环体系：获取与消费导致商品生产的维持与扩张，并进而支撑有偿就业。单独来看，所有这些活动对社会福祉都不可或缺。然而，这一整体观念的不足之处，既可从社会评论家在世界各地大量就业者身上察觉到的冷漠中窥见，也可从日益庞大的失业群体所陷入的士气低落中看出。

因此，人们日益认识到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这并不令人意外。在这一点上，唯有通过科学与宗教知识体系的创造性互动所产生的洞见，才能带来习惯与态度如此根本性的转变。动物依赖环境所轻易提供的一切来维持生存，而人类则被驱使通过旨在满足自身及他人需求的生产性劳动，来展现自身潜藏的巨大能力。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无论程度如何低微，都成为了文明进步进程的参与者。他们实现了将自己与他人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巴哈欧拉说，当工作本着服务人类的精神自觉进行时，它便是一种祈祷的形式，一种崇拜上帝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待自己，而无论所推行的计划性质如何，无论它们承诺何种回报，发展战略都必须诉诸于自我这一不可剥夺的能力。任何更狭隘的视角都永远无法从世界人民中唤起未来经济任务所需的巨大努力与奉献。

环境危机也给经济思维带来了类似的挑战。某些理论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自然满足人类任何需求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些理论的谬误如今已被无情地揭露。一种将扩张、占有以及满足人们欲望赋予绝对价值的文化，正被迫认识到这些目标本身并不能作为现实的政策指南。此外，同样不足的是，那些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其决策工具无法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重大挑战在范围上都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部性的。

有人真诚希望通过违逆自然本身来应对这场道德危机，这恰恰证明了该危机所引发的精神与思想上的绝望。认识到创造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人类有责任照管这一整体——这一点虽值得欢迎，但其本身并不足以在人们的意识中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唯有在最充分意义上兼具科学与灵性的突破性认知，才能使人类有能力承担历史所赋予的托管之责。

例如，所有人迟早都必须重新找回知足的能力、对道德规范的欣然接纳以及对职责的奉献精神——这些品质直到不久以前还被视为人性的基本要素。纵观历史，各大宗教创始人的教义曾一再成功地向那些响应其号召的广大民众灌输了这些品格特质。如今，这些品质本身更为重要，但其表现形式必须与人类的成熟相适应。在此，宗教所面临的挑战是摆脱过去的执念：知足并非宿命论；道德与那种常常假借其名、否定生命的清教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真正的尽职尽责所带来的并非自以为是，而是自我价值感。

妇女长期未能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这一状况使科学与宗教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更趋尖锐。对任何客观观察者而言，两性平等原则是一切关于地球及其人民未来福祉的现实思考之根本。它代表着一条关于人性的真理，而这条真理在人类漫长的童年与青春期岁月中，基本上一直未获承认。巴哈欧拉着重断言：“在上帝眼中，男女向来平等，且将永远如此。”理性灵魂没有性别；过去或许曾因生存需要而规定了某些社会不平等，但在人类即将迈入成熟门槛之际，这些不平等显然已无法自圆其说。

事实上，从重要意义上说，这一领域的进步本身将成为衡量任何发展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准。鉴于经济活动在文明进步中的关键作用，发展进程的快慢将通过妇女获得参与所有经济活动途径的程度而直观体现。这一挑战超越了确保机会公平分配——尽管这一点很重要。它要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经济问题，以一种能够邀请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的广泛人类经验与洞见全面参与的方式。传统的非人格化市场经济学模型将人类视为追求自我利益的自主决策者，无法满足一个以团结与正义理想为动力的世界的需求。社会将发现自己日益面临发展新经济模型的挑战，这些模型的形成源于对共享经验的同情理解，源于将人类置于与他人关系之中加以看待，以及源于认识到家庭与社区的角色对社会福祉具有核心地位。这样一种智识突破——其焦点是强烈的利他主义而非自我中心——必须极大地借鉴人类的灵性与科学感悟力，而数千年的经验已使妇女为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做好了准备。

VI

思索如此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引出两大问题：一是可借以成就此变革的力量从何而来，二是与之密不可分、有权行使这一力量的权威何在。如同地球及其人民加速融合所蕴含的一切其他深意，这两个熟悉的概念均亟待重新界定。

纵观历史——尽管神学或意识形态曾提出与之相悖的主张——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解读为个人或群体所享有的优势。事实上，它常常仅仅被表述为用以对抗他人的手段。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已成为分裂与冲突文化的固有特征；过去数千年间，无论世界某一地区、某一时代占据主导的是何种社会、宗教或政治思潮，人类始终未能摆脱这一特征。总体而言，权力一向被视为个人、派别、民族、阶级与国家的属性，尤其被视为与男性而非女性相关的属性。其主要作用，便是赋予其受益者获取、超越、支配、抗拒与取胜的能力。

由此产生的历史进程，既给人类福祉带来了毁灭性的挫折，也造就了文明的非凡进步。在肯定其益处的同时，亦必须承认那些挫折，以及催生了这两者之行为模式所具有的明显局限。在人类漫长的幼年期与成长期中所形成的与权力运用相关的习惯和态度，其有效性已抵达极限。当今时代，绝大多数紧迫问题都具有

全球性质，若继续坚持权力意味着人类大家庭中不同群体各自谋取优势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极其错误，对地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也毫无实际裨益。那些依然固守此观念的人——在更早的时代，他们曾因这种坚守而满怀自信——如今却发现自己的计划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挫败与阻碍之中。以传统、竞争性形式呈现的权力，之于人类未来的需求，其不相干的程度，恰如铁路机车技术之于将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这一事业。

这一比喻甚为贴切。人类正被自身成熟的需求所催迫，亟需从承袭而来的权力认知与运用方式中挣脱出来。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然有事实佐证：尽管一直受传统权力观念的支配，人类始终能够构想其他形式的权力——这些权力对其希望至关重要。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古往今来，无论背景如何，人们都曾或多或少、或娴熟或笨拙地发掘出自身内在的广泛创造潜能。或许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真理本身所蕴含的力量——这一变革的动因，与人类在哲学、宗教、艺术及科学实践中所取得的诸多最伟大进步紧密相关。品格的力量是另一种能够凝聚巨大人类共鸣的方式，榜样的影响力亦是如此——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人类社会层面，皆然。而团结所催生的力量之宏大，却几乎完全未被世人所重视。用巴哈欧拉的话说，这种影响力“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

社会机构能否成功激发并引导蕴藏在世界各国人民意识中的潜在力量，取决于其行使权威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否与快速成熟的人类不断演进的利益相契合。这些原则包括：掌权者有义务赢得那些其试图规范其行为者的信任、尊重与真诚支持；有义务与所有利益会受决策影响的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公开磋商；有义务客观评估其所服务社区的真实需求与民众愿望；有义务借助科学与道德的进步，合理运用社区资源——包括其成员的能量。在有效权威的各项原则中，没有哪一项比优先建立并维护社会成员与其行政机构成员之间的团结更为重要。前文已提及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即要在所有事务中致力于追求正义。

显然，这些原则唯有在一种精神与方法本质上具有民主性的文化中才能发挥作用。然而，这样说并非是要认可那种处处冒用民主之名的派系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过去曾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但如今却深陷于其自身所催生的玩世不恭、冷漠疏离与腐败堕落之中。在选拔代表社会作出集体决策的人员时，社会并不需要、也不会从提名、候选、竞选造势与拉票游说等政治闹剧之中获益。当全体人民逐步接受教育，并确信向他们提出的方案能够服务于其真正的发展利益时，他们便有能力采用选举程序，进而逐步完善其决策机构的选拔机制。

随着人类一体化的进程持续推进，在此趋势下，那些经由程序选出的决策者，将愈发需要以全球视野审视自身的一切努力。在巴哈欧拉看来，各级人类事

务的当选治理者——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应认识到，自己肩负着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责任。

VII

制定一项旨在加速人类走向成熟期的全球发展战略，这一任务构成了一项从根本上重塑所有社会机构的挑战。这项挑战所面向的行动者，是地球上的全体居民：广大人类民众、各级治理机构的成员、在国际协调机构任职的人员、科学家与社会思想家、所有拥有艺术才华或能接触传播媒介的人，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所需作出的回应，必须建立在无条件承认人类一体性、立志将正义确立为社会组织原则、以及决心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类科学与宗教才智之间系统性对话所能为人类能力建设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之上。这项事业要求彻底重新思考当前主导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多数概念与假设。同时，它还必须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无论这一过程多么漫长、遭遇何种挫折，人类事务的治理都能够沿着服务于人类真正需求的方向推进。

唯有当人类的集体幼年期真正结束、成年时代已然开启，这一前景才不再是另一种乌托邦式的幻影。若认为心灰意冷、彼此敌对的民族与国家能够凝聚起本文所构想的这般宏伟力量，这与人类所有公认的智慧相悖。正如巴哈欧拉所断言的那样，唯有当社会演进的进程抵达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世间所有存在的现象皆被猛然推向其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可能性才能够被构想。人类意识正经历如此深刻变革的坚定信念，启发了本宣言所阐述的各项观点。对于所有在其中感受到内心深处熟悉呼唤的人，巴哈欧拉的话语带给他们确信，在这无与伦比的年代，上帝已赋予人类足以应对这一挑战的灵性资源：

天地间的众生啊！那前所未有者已然显现。

此乃上帝的至伟恩泽倾洒人类之日，此乃祂的至大宠爱灌注一切受造物之时。

如今震撼人类事务的动荡史无前例，其所引发的诸多后果极具毁灭性。有史以来从未想象的种种危险，正笼罩着困惑彷徨的人类。然而，值此关键时刻，世界各国领袖所能犯下的最大谬误，便是任由这场危机动摇对当前正在展开之进程最终结局的信心。旧世界正在消逝，新世界奋力降生。千百年来积淀的习俗、观念与制度，正经受着对人类发展既不可或缺、亦无可回避的考验。万物之创造者已为人类这一精神春天注入磅礴能量；世间万民所需具备的，正是与之相称的信念与决心。巴哈欧拉如是呼吁：“在磋商中团结，”

在思想上一致。愿每个清晨比其前夕更美好，每个明天比其昨日更富饶。人的价值在于服务与德行，而非炫耀财产与富有。要慎言，戒绝无谓幻

念与俗欲；要笃行，摒弃狡诈与猜疑。勿将你宝贵的人生虚掷于邪恶与堕落之追求，亦勿专为一己之私利操劳。富足时须慷慨，贫困时须忍耐。逆境紧接成功，欢乐跟随悲痛。无论老幼贵贱，皆须谨防懒散与怠惰，奉行有益于人类之事。要当心，勿在人们中播下不和之种子，或在纯洁明亮之心田种下怀疑之荆棘。